北语学人书系

第二辑

# 李玲
# 现当代文学研究文集

李玲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语学人书系
第二辑

# 李玲
# 现当代文学研究文集

李玲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9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图号 190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玲现当代文学研究文集 / 李玲著 . --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9.6
（北语学人书系 . 第二辑）
ISBN 978-7-5619-5479-9

Ⅰ. ①李… Ⅱ. ①李… Ⅲ.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Ⅳ. ①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3685 号

李玲现当代文学研究文集

LILING XIANDANGDAI WENXUE YANJIU WENJI

排版制作：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周 燚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子信箱：service@blcup.com
电　　话：编 辑 部　8610-82303390
　　发 行 部　8610-82303650/3591/364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302 千字
定　　价：72.00 元

PRINTED IN CHINA

# 出版说明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以语言教学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文、外语及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和发展，中、外语言文学已然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两大支柱学科。依托这两大学科，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其中有的已成为本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北语学人在学界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和不可忽视的力量。

倏忽之间，北语建校已经55周年。55年来，代有才人出。5年前，建校50周年时，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学校对北语学人珍贵的学术积累进行了系统梳理，将北语学人的优秀成果集结成册，交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北语学人书系（第一辑）”得以问世。为体现北语学术的原创性和延续性，“北语学人书系（第二辑）”的出版计划于2017年北语55周年校庆之际制订，科研处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遴选标准征集了10位博士生导师的论文，每人自成一册，陆续出版。书系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可谓百花齐放。

为完成这批高质量书稿的征集和出版工作，校科研处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各位作者积极甄选论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高度重视，编辑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正是北语精神的具体体现，亦当记录并彰扬也。

北京语言大学

2017年12月

# 目　录

## 女性创作的性别意识

003 / “五四”女性文学的青春情怀

021 / “五四”女性文学的自然观

038 / 超越怨恨
——论张爱玲创作中的主体间性思维

051 /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
——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 男性创作的性别意识

067 / 哪一种传统观念？哪一种现代意识？
——《玉梨魂》的男性至情观

084 / 易性想象与男性立场
——茅盾小说《蚀》与《野蔷薇》中的性别意识分析

103 / 郁达夫新文学创作中的现代男性主体建构

124 / 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140 / 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153 /《围城》的男性偏见

166 / 存在的不完满性与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性别建构

## 现代知识分子立场

187 / 从重建民族主体性视角审视闲适文化传统
——由《二马》《四世同堂》说开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7 / 老舍《离婚》中的存在追问与生命悲感
213 / 老舍《牛天赐传》中的现代理性价值和超理性价值
225 / 乐生旷达，优雅风趣
——梁实秋散文论
234 / 贾平凹《怀念狼》的原始思维与概念化写作问题
244 / 井上靖小说《敦煌》的生命境界建构

## 女性文学理论建设及研究现状分析

259 /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
271 / 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
281 / 评新时期的冰心研究

297 / 后记

# 女性创作的性别意识

# “五四”女性文学的青春情怀

“五四”女性文学主要有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石评梅、苏雪林、陈学昭、陆晶清、白薇、濮舜卿的作品以及丁玲早期的创作。“五四”女作家虽然广泛关注社会现实，但其创作中表现最深刻、艺术创造最成功的，则是她们自己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本文以中国女性文学和“五四”文学为背景，从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母女亲情、童心世界、女性情谊、性爱意识五个方面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怀及其审美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学开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思想、艺术价值。

“五四”女作家在性别方面具有明确的平等意识。此种平等意识以现代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为根基，具有鲜明的启蒙文化特色。“五四”女性文学虽然并非自觉的女性主义创作，但第一次全面展示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权藩篱时的独特心声，却烛照出女性生活中许多始终不被注意的侧面，开启了女性文学的许多崭新话题，激烈否定了封建男权传统，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珍贵源头。尽管在理论建构层面上，“五四”女作家只关注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特质，而较少考虑两性平等前提下的性别差异性；但她们的创作由于忠实于现代女性的心灵体验，因

此实际上已经既体现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意识，又展示了女性精神世界的差异性特质。

## 一

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①] 能否突破传统的社会性别藩篱、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女性主体性建构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近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社会意识的发展，秋瑾等少数杰出女性投身到民族振兴的事业中，在对抗封建君主制的同时对抗男权制度，在创作中表现了女性介入社会生活的愿望和胆识。秋瑾创作中所展示的女性独立不羁的主体精神，在晚清如空谷足音。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女性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使女性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

"五四"女作家大多数是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作家的生活视野决定了"五四"女性文学更着重于抒写女性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时的心路历程，而较为忽略她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实情形。"五四"女作家在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时，首先表达了觉醒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表达了她们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同时也真实地袒露了她们在追寻这个理想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困惑。

女性要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收回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利。第一位以昂扬的气度高唱把握命运之歌的现代女作家，是陈衡哲。"……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②] "造命"相对于"安命"和"怨命"而言，是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主动把握。这种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载《衡哲散文集》下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

统女性意识，使陈衡哲的创作获得了刚健豪迈的力度，有别于偏重婉约的传统女性文学。在诗歌《鸟》、散文诗《老柏与野蔷薇》《运河与扬子江》以及童话《小雨点》中，陈衡哲通过童话思维和象征手法的普遍运用，把激扬的浪漫主义情感外化为一系列具有高度生命自觉的拟人化动植物形象，达到了艺术地表现情感的审美基本要求。但简单的类比对照和随意的拟人化处理，也使其中多数艺术形象仍然跳不出作者思想情感传声筒的窠臼，显得单一、平面化。因此，陈衡哲高唱“造命”之歌的创作难免质胜于文。濮舜卿的三幕话剧《人间的乐园》则把女权启蒙的意义与人的解放结合起来。该剧改编自《圣经》故事，设置一个智慧女神的形象引领夏娃、亚当走出蒙昧的伊甸园，到人间去开创新生活；而在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夏娃又表现出比亚当更为坚定顽强的奋斗精神，被智慧女神称作“女权运动的始祖”。这里，濮舜卿把女性主体性建构作为人的解放的基石，充分表现了现代女性对自我性别主体价值的自信。在独幕剧《黎明》中，濮舜卿再次展示了她的女权解放观念。该剧以象征主义创作方法批判男性世界、礼教、金钱、舆论对女性的压迫，提倡男女两性的“互助”。自觉批判男权力量，而不仅仅是在反叛父权中回避对异性世界的审视，濮舜卿的戏剧充分展示了现代女性主体精神强健的风貌。

重新建构主动把握命运的现代心理范式，女性才可能以人的自觉去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冰心将青年“牺牲自己服务社会”[①]的崇高理想凝聚成“灯台守”的诗意形象，并由此升华出一种普泛的人生追求，认为“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②]。石评梅“一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便觉得重担在身，“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斗的

① 冰心：《秋雨秋风愁煞人》，原载1919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晨报》，第7版；转引自《冰心全集》第一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② 冰心：《往事（二）》之八，原载1924年7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7号；转引自《冰心全集》第二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80页。

编者注：本书中引用的作品原文，由于当时的用字习惯，原文中个别用字与现在的规范用字有所不同，本书引文一概保留原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①]。她在书信体散文《露沙》中热忱地向友人倡议道：“露沙呵！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②] 陈学昭则希望女子能在“政治、教育、职业、蚕业、商业、医业、文学、艺术”各方面都能有所建树[③]。

无论是冰心的形象化表达还是石评梅、陈学昭的直抒胸臆，“五四”女性文学对妇女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思考大都偏于诗意和空泛。她们以女性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激情关注社会，但对女性应该如何投身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与人民革命的时代主潮还无法做出任何具体的设想。与此相应，她们表达理想的创作往往向抒情、议论文体倾斜，在激情、议论的自由表达中回避事件、细节的描摹、想象。这点与后来“左联”和解放区文学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描写形成鲜明对比。

“五四”女性一旦把服务社会的满腔热忱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往往陷入无法摆脱的苦闷。“五四”女性文学真实地袒露了觉醒女性的这一精神困境。这种困境首先是“五四”女性生存处境对其人生理想的抑制。初步觉醒的女性环顾周遭世界，发现至少有两道难以逾越的关坎阻止女性踏上社会公共领域：一道关坎是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另一道关坎是黑暗的社会现实。

集中思考女性由于不合理的家庭生活方式而陷入社会困境的女作家包括冰心、庐隐、陈衡哲、凌叔华等人。冰心的《秋雨秋风愁煞人》、庐隐的《海滨故人》、凌叔华的《绮霞》等小说都表达了女性由于不合理的家庭生活方式而难以介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这一主题。冰心是站在觉醒男女相一致的立场上质问封建旧家庭的。巴金、曹禺、路翎等在揭露旧家庭时所倾泻的青春的热情和苦痛，均可在冰心的《秋雨秋风愁煞人》中找到最初的现代源头。庐隐、陈衡哲、凌叔华则更多地单独从女性角度，思考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事业的矛盾。由于缺少究根寻底的深层理性批判，她们都和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无力进一步溯本探源去质疑

---

①② 石评梅：《露沙》，载《石评梅作品集·散文》（杨扬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③ 陈学昭：《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载《海天寸心——陈学昭散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只能或于痛苦的旋涡中憔悴，或在有所回避中寻找慰藉。但正是她们这些不免幼稚的思考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崭新传统，为新时期文学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入探寻奠定了基础。

“五四”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阻碍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也表明了黑暗的“五四”社会现实根本没有提供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可能。庐隐、石评梅、陈学昭、丁玲等都以大量的书信体、日记体创作倾诉对社会黑暗的痛切感受。她们笔下受挫青年（无论男女）的心态都明显地倾向于柔弱、忧郁，而不同于鲁迅等同时期男作家笔下主人公（如魏连殳）的绝望、冷峻。这是因为，无论从觉醒者成长的历史看，还是从个人成长的历史看，这些女作家都不免年轻、稚嫩。面对社会黑暗，“五四”初期的觉醒女性往往自觉地与同一处境中的青年（无论男女）结成精神盟友。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去国》、庐隐的小说《彷徨》，都以男性为主人公表现青年所受的社会压抑和精神苦痛。“五四”后期，丁玲的小说《梦珂》中，青年男女精神同盟已经解体，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情色消费构成了社会的主要黑暗力量。这些围猎女性的男性，有留学归来的学子，也有沪上文豪、戏剧家；而女主人公梦珂虽然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丑恶面目，但“依然是隐忍地，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①]。

觉醒女性在现实中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围困，难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现实中的不自由感必然会更深地引起女性对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五四”女作家常常借描述人物心理在作品中展开大段的人生哲理讨论，这进一步形成了“五四”女性文学普遍的议论化、抒情化倾向。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便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大量抒写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充分证明了中国女性在受封建男权压抑数千年后已经渐渐苏醒，并初步获得了独立的主体人格，能够以人的自觉来审视自身存在了。但另一方面，初步觉醒时期的青春稚嫩往往又限制了“五四”女作家的思想力度，使她们和笔下主人公普遍都无法将充满灵性的生命感悟当作理性思辨的起点，由此出发建构起自己的人生哲学。无论在正视绝望的深度上还是在反抗绝望的力度上，这些女作家都没

① 丁玲:《梦珂》，载《丁玲短篇小说选》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能达到鲁迅等优秀思想家的理性高度。在面对人生哲理的困惑上，冰心是女作家中的例外，也是“五四”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她接受了东方哲学的影响，从宇宙万物无论形态如何变化，精神上都是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感悟中寻找到了心灵归宿，认为“万全的爱”[①]是世界的本质。冰心把精神看作超时空的存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广博爱心和乐观精神默默地温暖了在黑暗中上下求索的青年的心，她庄严静穆的诗性情感和优美纯净的语言风格也使其创作在艺术提炼上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女作家。

从把握命运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到满怀豪情地要为社会服务，再到受困于家庭和社会的层层阻碍，以至感受到生命不自由的苦痛，而去探寻人生的哲理，现代女性初次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这一征程中的豪情与怯惧、觉悟与沉迷在“五四”女性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20 世纪中国文学对女性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过程中内心经历的抒写可谓源远流长。

## 二

“五四”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还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利。这样，父母作为压制青年爱情幸福的力量，必然处于被审问的位置。但由于天然的亲情联系和初步觉醒者的稚嫩心态，父母同时又是“五四”青年无法割舍的心灵依靠。这两种矛盾对立的情感互相牵扯，“五四”女作家暂时还无力从中整合出完整统一而又复杂多层的父亲形象，一般总是对青年与父亲的关系保持沉默，从而回避自己反叛父权与渴望父爱的心理矛盾。与此相反，母亲形象、母女深情频频出现在“五四”女性文学中，成为创作的一个聚焦点。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五四”女性与母亲之间的事务联系和情感联系都远远大于她们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她们对女性处境的认识最初更是通过对母亲生存境遇的观照而产生。“五四”女作家虽然同样难以在心中整合出富有典型意义

① 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原载 1920 年 4 月 30 日《晨报》；转引自《冰心全集》第一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3 页。

的母亲形象，但这并没有造成创作中母亲形象的失落，而是使得她们把创作的重心放在表现“五四”青年——尤其是女儿——对母亲的复杂情感上。

在冰心、冯沅君、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眼里，母亲首先是养育女儿、挚爱女儿的恩者。这些女作家很少设置在人生的紧要关头让母亲在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儿女的利益之间做出抉择的情节，她们年轻的心也还未曾注意到母亲在孕育、分娩这些特殊时刻的艰辛困苦，而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中细腻地体察母亲对女儿的关怀。她们固然也通过描写聚散离合中的一些典型细节来表现母爱，但她们对母爱激荡自己心灵的抒写远远多于对母亲具体行为的描述。冰心的创作在这点上最为典型。在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作品中，除悼亡散文《南归》一篇外，冰心极少涉及体现母亲爱心的生活细节，却在别后的思念中恣情歌唱母爱的超功利性和永恒性。

“五四”女作家不仅歌唱母女之间诚挚的天然亲情，还把这种质朴的情感升华为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比如冰心在作品中表达：“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①] 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一般都习惯于在精神苦闷的时候直接向母亲倾诉痛苦。尽管作为传统女性的母亲们一般都无法真正理解女儿的内心世界，更不具备引导女儿人生之路的思想素质，但亲密无私的母女之情盖过了思想上的巨大鸿沟，使慈母襟怀成为“五四”女儿最安全的心灵港湾。这与后来革命文学中母女亲情常常引导人物思想觉悟的提高截然不同。由于思想上的差距，“五四”女作家向慈母倾诉痛苦的创作表面上是对话，实际上往往是独语。

冰心感受到母爱对女儿的心灵庇护，还推而广之，把母爱看作整个世界走向光明的精神动力。其推理逻辑虽然幼稚、勉强，但把照耀历史的神圣光辉奉献给只有女性才具有的母爱上，却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胆反拨，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热忱肯定。对母爱执着不倦的讴歌使冰心成为最富有代表性的母爱作家。

作为长期被困于旧家庭的传统女性，母亲不仅是女儿的庇护者，还是封建

① 冰心：《繁星·一五九》，载《冰心全集》第一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礼教的受害者，是无法反抗命运的弱者。“五四”女作家还以现代女性的觉悟去审视母亲作为家庭女奴的人生境遇，悲悯母辈的苦难。在苏雪林的小说《棘心》中，婆婆的外部压迫和自己的内心蒙昧把母亲钉在形同奴隶的位置上不得动弹，也不想动弹。对母亲苦难的认识，在苏雪林的创作中并没有指向对男权力量的直接抨击，也没有指向对女性觉醒的热切呼唤，而是与同情、敬爱母亲的情感紧密相连。这说明此时苏雪林对封建男权的否定主要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凌叔华的短篇小说《一件喜事》用一个六岁小女孩儿的视角，表现了男权专制对母亲的无情伤害，以及母亲在这种伤害面前的无可奈何的隐忍。“一件喜事”指的是父亲的第六房姨太太进门。同是姨太太的妈妈、三娘、五娘必须领着孩子，以旁观者的身份向自己的丈夫及新姨太太道喜；同时，又要把丈夫纳妾当作自己的喜事看，自己也去接受孩子们的祝贺。小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传统女性生存真相：男权绞索勒在母辈女性的脖子上，逼迫她们在受伤害的时候还要做出欣喜的姿态，以掩饰一夫多妻制度的罪恶。另一篇小说《八月节》中，凌叔华则从家族传宗接代的角度再次揭示了母辈女性生命贬值的状况和女性人格异化的现象。

母辈女性在男权桎梏中含辛茹苦地过着家庭女奴的生活，她们从小就在礼教规范的熏陶中成长，很容易把这种奴隶教条视为天经地义。当“五四”女儿要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行处理恋爱婚姻问题时，多数母亲，无论她们怎么挚爱女儿，常常会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当作不可违逆的原则，以父权代言人的身份来反对女儿争取幸福的举动。觉醒的“五四”女儿常常因此陷入反叛封建父权与维护母女亲情的矛盾痛苦中。

冯沅君笔下争取婚姻自由的女青年，往往无法将母爱与母亲所坚持的封建立场区别开来对待，从而陷入要么辜负慈母、要么向封建父权妥协的两难境地。冯沅君在《隔绝之后》中只好让死神来调和母爱与男女之爱的矛盾，使得觉醒的“五四”女儿得以逃避审判母亲的情感劫难；但避开了这一道关坎，“五四”女儿也就失却了一个进一步走向成熟的精神断乳时机。同是回避矛盾，苏雪林在《棘心》中是以鸵鸟式的自欺欺人，让女青年醒秋在父母安排的婚姻内臆想爱情幸福。叙述者、隐含作者与主人公立场一致，共同沉醉于矛盾妥协调和的梦想中。

这表明苏雪林对封建礼教比冯沅君多一分怯惧，也多一分幻想。

出于初步走上社会人生之路的女儿心态，“五四”女作家多从女儿角度抒发自己对母爱、对母亲生活的感受，陈衡哲和袁昌英则是例外。在对母爱与两性之爱冲突的思考中，陈衡哲独树一帜地把目光投注在一个异域母亲身上。她在小说《一支扣针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对儿女的爱而牺牲两性之爱的高尚母亲——西克夫人的形象。叙述者“我”完全是以朋友般的平等态度与西克夫人交往，也是从平视的角度来叙述她的生活的。袁昌英的话剧《孔雀东南飞》改写自汉代同名叙事长诗，她把刘兰芝与焦仲卿婚恋悲剧的原因阐释为焦母独占儿子的变态心理。可贵的是，袁昌英既深刻批判了焦母自私、残忍、势利的性格，又深切同情她夫死之后长年守节的精神痛苦。焦母既是礼教的压迫者又是礼教的受害者，袁昌英从这一人物塑造的角度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展示了现代女作家超越封建孝道、坚守“平等的人”的观念的精神力度。而平等地审视母亲的精神世界，表明陈衡哲、袁昌英比其“五四”姊妹们更早地走出了“小儿女”心态。

“五四”女作家在大量的创作中，通过平凡人生的点点滴滴确认母爱的神圣。这些作品烛照出了女性生活中一个极为温暖而又始终不被注意的侧面。“五四”女性文学对母亲的家庭女奴地位的揭示，则是现代女性对传统女性险恶生存境遇的深刻观照。“五四”女性文学展示“五四”女儿面对慈母爱心与封建父权联盟时的束手无策，则表现了女性踏上现代人生征途的艰巨性。只有走过这一段仰视母亲的女儿路，现代女作家才可能逐渐成长为真正成熟的女人，从而进一步去塑造母亲丰富多面的立体形象。正是从“五四”开始，母亲才成为女性文学中一个书写不尽的重要形象，对母女亲情的揭示才成为一个被广泛咏唱的永恒主题。“五四”女性文学中闪动着眷眷女儿心的青春风貌是现代女性文学无法重复的珍贵源头，“五四”女性文学对母亲精神世界的平等审视则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审母”传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